

# 寸 土 随 谈

叶圣陶◎著

下

大衆文艺出版社

青年译本

叶圣陶题



C539  
38  
:2

青年读本

# 过去随谈

叶圣陶 著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多活几年 多做些事

近两年来，我耳失其聪，目失其明。过去讲“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说七十岁不稀奇。不管哪种说法，七十即使不能算老，但是总到了退休的年龄。前年有一个杂志叫《长寿》，让我写几个字。人老了做什么？当“老寿星”，人矮而胖，形体没有什么健康美，还要两个童子陪在旁边，当这样的“老寿星”没有意思。我给那家杂志写了八个字：“多活几年，多做些事。”人生不过如此，多活几年就要多做些事。做什么样的事情？事情无论大小，只要脚踏实地，不说空话，或者尽可能少说空话，对于咱们社会，对于咱们新中国总有点好处。多活几年，多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摆起架子，说我要培养人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好像太严重了；能否降低一点儿说，就是给几个人有点儿好的影响。到了古稀之年，总要对于一两个或更多的人，给他们好的影响。影响并不是一定要他像我，我是说经过我的影响，尽可以超过我，胜过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假使大家都这样做，算起总账来就很有意义。假如一个人到了古稀之年，能给一个人一点好的影响，算起总账来不亏本，假如使两个人超过我，胜过我，就有盈利。假如更多的人受我的影响，盈利就大得很了。到了古稀之年的人，大家都作这样打算，我看是要得的。我愿意用这样浅薄的话自勉，也与诸位同志共勉。

## “习惯成自然”

“习惯成自然”，这句老话很有意思。

我们走路，为什么总是一脚往前，一脚在后，相互交替，两条胳膊跟着动荡，保持身体的均衡，不会跌倒在地上？我们说话，为什么总是依照心里的意思，先一句，后一句，一直连贯下去，把要说的都说明白了？

因为我们从小习惯了走路，习惯了说话，而且“成自然”了。什么叫做“成自然”？就是不必故意费什么心，仿佛本来就是那样的意思。

走路和说话是我们最需用的两种基本能力。推广开来，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强强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如果连勉勉强强做一做也不干，当然更说不上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了。

听人家说对于样样事物要仔细观察，才能懂得明白，心里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这当儿，我们还不是已经有了观察的能力。

听人家说劳动是人人应做的事，一切的生活资料，一切的文明文化，都从劳动产生出来的，心里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这当儿，我们还不是已经有了劳动的能力。

听人家说读书是充实自己一个重要法门，书本里包含着古人今人的经验，读书就是向许多古人今人学习，心里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这当儿，我们还不是已经有了读

书的能力。

听人家说人必须做个好公民，现在是民主的时代，个个公民尽责守分，才能有个好秩序，成个好局面，自己幸福，大家幸福，心里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这当儿，我们还不是已经有了做好公民的能力。

这样说下去是说不完的，就此打住，不再举例。

要有观察的能力，必须真个用心去观察。要有劳动的能力，必须真个动手去劳动。要有读书的能力，必须真个把书本打开，认认真真去读。要有做好公民的能力，必须真个把公民应做的一切事认认真真去做。在相信人家的话很有道理的时候，只是个“知”罢了。“知”比“不知”似乎好些，但仅仅是“知”，实际上与“不知”并无两样。到了真个去观察去劳动……的时候，“知”才渐渐化为我们的习惯，习惯成自然，才是我们的能力。

通常说某人能力不强，就是某人没有养成多少习惯的意思。譬如说张三记忆力不强，就是张三没有把看见的听见的一些事物好好记住的习惯。譬如说李四发表力不强，就是李四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说出来写出来的习惯。

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越强。我们做人做事，需要种种的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

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教育不限于学校，也不限于读书，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一部分。读书这件事也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我们离开了学校，仍然要从种种方面受教育，并且要自我教育，目的还是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习惯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强越好，孔子一生“学而不厌”，就为他看透了这个道理。

## 两种习惯养成不得

在本志第一期中，我说“习惯成自然”才是能力，一个人养成的习惯越多，他的能力越强。这一回要说的是习惯不嫌其多，有两种习惯却养成不得，除掉那两种习惯，其他的习惯多多益善。

哪两种习惯养成不得？一种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又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

什么叫做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举例来说，容易明白。坐要端正，站要挺直，每天要洗脸漱口，每事要有头有尾，这些都是一个人的起码习惯，有了这些习惯，身体与精神就能保持起码的健康。但是这些习惯不是一会儿就会有有的，也得逐渐养成。在没有养成的时候，多少要用一些强制功夫，自己随时警觉，坐硬是要端正，站硬是要挺直，每天硬是要洗脸漱口，每事硬是要有头有尾。直到“习惯成自然”，不待强制与警觉，也能行所无事的做去，这些就是终身受用的习惯了。如果在先没有强制与警觉，今天东、明天西，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那就什么习惯也养不成。而这今天东，明天西，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倒反成为一种习惯，牢牢的在身上生根了。这种习惯就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最要不得。为什么最要不得？只消一句话回答：这种习惯是与其他种种习惯冲突的，养成了这种习惯，其他种种习惯就很少有养成的希望了。

什么叫做妨害他人的习惯？也可以举例来说。走进一

间屋子，砰的一声把门推开，喉间一口痰涌上来了，扑的一声吐在地上，这些都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事。但是很紧要，因为这些习惯都将妨害他人。屋子里若有人在那里做事看书，他们的心思正集中，被你砰的一声，他们的心思扰乱了，这是受了你的影响。你的痰里倘若有些传染病菌，噗的一声吐在地上，这些病菌就有传染给张三或李四的可能，他们因而害起病来，这是受了你的影响。所以这种习惯是“妨害他人的习惯”，最要不得。在“习惯成自然”之后，砰的一声与噗的一声将会行所无事，也就是说，妨害他人将会行所无事。一个人如果明瞭自己与他人的密切关系，不愿意妨害他人，给他人不好的影响，就该随时强制，随时警觉，不要养成妨害他人的习惯。不问屋子里有没有人，你推门进去总是轻轻的，不问你的痰里有没有传染病菌，你总是把它吐在手绢或纸片上，这样“习惯成自然”，你就在推门与吐痰两件事上不致妨害他人了。推广开来说，凡是为非作歹的人，他们为非作歹的原因固然有许多，也可以用一句话来包括，他们的病根在养成了妨害他人的习惯。他们不明瞭自己与他人的密切关系，他们不懂得爱护他人，一切习惯偏向妨害他人的方面，他们就成了恶人。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是头等的恶人，其他如贪官、污吏、恶霸、奸商，也都是恶人中的代表角色。这些恶人向来为人们所痛恨，今后的世界上尤其不容许他们立足。谁要立足在今后的世界上，谁就得深切记住，不要养成妨害他人的习惯。

习惯不嫌其多，只有两种习惯养成不得，一种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又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

## 知识分子

有些研究历史的人说我国的传统政治是“中国式的民主”，他们的论据是：我国的传统，政府中的官吏完全来自民间，既经过公开的考试，又把额数分配到全国各地，并且按一定年月，使新分子陆续参加进来，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成了。

“民主”这个词儿来自西方，不是我国所固有，咱们也不必考据这个词儿的语源，大家心目中自然有个大致共通的概念。总之，咱们决不把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叫做民主，就像咱们决不把一家老板店，因为他选用了张三李四等人做伙计，就认它是公司组织。在传统政治上，做官只是当伙计。伙计之上有个老板在，就是皇帝。汉唐盛世也罢，叔季衰世也罢，皇帝总是“家天下”的。他行仁政，无非像聪明的畜牧家一样，给牛羊吃得好些，好多挤些奶汁。他行暴政，也只是像败家子的行径，只顾一时的纵欲快意，不惜把自己的家业尽量糟蹋，结果至于家破人亡。皇帝而能“公天下”，站在民众的立场，为民众的全体利益着想，那是不能想像的事。如今咱们心目中的民主却是真正的“公天下”，全体民众个个是老板，成个公司组织，决不要一个人当老板，由一批伙计来帮他开店。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也知道，要是把我国的传统政治认为咱们心目中的民主，那未免歪曲得过了分，自己也不好意思，因此，只得勉勉强强加上“中国式的”四个字，以



便含混过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说得委婉些，可以借用《庄子》里所说的，“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说得直捷些，就是他们想做官，为了想做官，宁可违犯几个月以前发布的《审查图书杂志条例》中“不得歪曲历史事实”的条款。

放过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不谈，且来谈谈做官。自古以来，做官好像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固然很有些官儿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就是做官却是事实。换句话说，就是要找个老板，当他的伙计，帮他的忙。“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你看他找老板的心情何等迫切。像孔子那样的人物，虽然时代不同，不会有现代人心目中的民主观念，可是由于他的仁心，不能不说他心在斯民。然而他如果真个找到了个信用他的老板，就不能不处于伙计的地位，为老板的利益打算，至少不得损害老板的利益。而那老板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是先天矛盾的，那老板是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的。所以“致君尧舜上”只成为自来抱着好心肠的知识分子的梦想。尧舜当时是否顾到民众的全体利益，史无明文。咱们只知道一般历史学家的看法，尧舜而后再没有比得上尧舜的皇帝。梦想不得实现，于是来了“不遇”的叹息，来了“用舍行藏”的人生哲学。这是说，没有老板用我，我找不到个合式的老板，我就不预备当伙计就是了。那当然与老板毫无关系，他只是我行我素，照样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

做官也着实不容易。做官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算到了顶儿尖儿了。而且，在前面所说那些研究历史的人看来，宰相制度是“中国式的民主”的最好表现。他们说在明朝以前，宰相是政府的领袖，皇帝的诏命非经

宰相副署，不生效力，于此可见皇帝并不能专制，然而，单看汉朝一代，丞相因为得罪面罢黜的，被杀的，自杀的，就有不少。皇帝这个老板是很难侍候的，规谏他过了分，逢迎他不到家，都有吃官司的可能。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实在不算过分。所以二疏勇于早退，传为千古美谈。某人终身不仕，值得写在传记里，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不是说他们看透了皇帝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矛盾，故而不屑当皇帝的伙计，去侵害民众的利益，只是说他们比一般知识分子乖觉些，能够早早脱离危险，或者根本就不去接近危险罢了。一些高蹈的诗歌文章大抵是从这样来的。元朝人写些曲子，极大一部分表示看轻利禄的思想，骨子里只是说明了在异族入侵的时候，皇帝的伙计更不容易当，或者你想当也当不上。

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做皇帝的。历代打天下的与篡位的，都不是知识分子。这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实力，他注定是个伙计的身份。既然注定当伙计，即使他胞与为怀，立志要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碰到老板这一关，就只好完全打消。张横渠的“四句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志大言大了。前三句不去管它，单看第四句，他说要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太平？依咱们想来，该是指民众都得享受好的生活而言。民众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个概念，是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好的生活不是空口说白话，是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试想，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的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这样的太平是皇帝和他的伙计们所能容许的吗？这样的太平真个“开”了出来的时候，还有皇帝和他的伙计们存在

的余地吗？所以“四句教”只能在理学家的口头谈说，心头念诵，而太平始终开不出来，历代的民众始终在苦难中过活。

能够帮助皇帝的是好伙计。皇帝要开道帮他开道，要聚敛帮他聚敛，要提倡文术就吟诗作赋，研经治史，要以孝治天下就力说孝怎样怎样有道理，这些人所得的品评虽然未必全好，可是在当时总可以致身显贵，不愁没有好的享受。然而与民众的全体利益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从民众的全体利益出发，他们只是帮了皇帝的忙。你看，司马光编了一部史书，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资治”，不是说这是皇帝的参考书吗？司马光当然是个好伙计。还有王安石，他的新政没有能够推行。而今人却认他为大政治家。现在不问他是不是大政治家，单问他计划他的新政，到底为宋室打算，还是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想来也只能说他是宋神宗的一个好伙计，而不是代表什么民众的利益的吧。你要做官，不论做得好做得坏，只能站在皇帝的一边，站在皇帝的一边，自然不能同时站在民众的一边。武断一点说，我国历史上就不曾有过站在民众一边的官。

用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当皇帝的伙计，就说这是民主，那是小孩儿也骗不动的。不料偏有人要想骗这么一骗，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时代过去了，皇帝没有了，国家的名号也换过，改称民国了，可是看看教育界的精神，还是在那里养成一批伙计，看看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还是一副伙计的嘴脸。这倒不是民主能不能实现，民众能不能做成老板的问题。到机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来这么一个激变，那时候，该

实现的实现了。要做成的做成了，只有知识分子守着传统的伙计精神，以不变应万变，却是绝对没有安身立命的余地的。

1994 年 12 月

## 学问无用论

予同先生说，知识分子应该背着十字架到民众中间去赎罪，他写成了《学问赎罪论》。化鲁先生说，知识分子何妨替平民老百姓做工具，他写成了《学问易主论》。他们两位能反省，肯说老实话，不嫌拆穿西洋镜，我佩服。

我现在写这篇《学问无用论》，也是来一点儿反省。我自己很明白，我所以选这个题目由于我自己没有学问。没有，就说他没用，这是人情之常，不待弗洛伊特派的心理学家来戳破这秘密。

他们两位的题目都写着“学问”的字样，文字中间却没讲到学问是什么。学问究竟是什么？问多少人也许有多少个不同的回答。但一般人对于学问也有个笼统的概念，就是入学校“求学”以及到外洋“游学”所得的便是学问。予同先生化鲁先生没讲学问是什么，想来就为此。细读文字，他们所指的学问正是这个。

假若学问就是这样的东西，我想，学问是无用的。

学校教育承继着科举制度。送子弟进学校的父兄谁不期望子弟将来飞黄腾达。所谓飞黄腾达就是得到一种身份，可以不劳而获，而且“获”得特别丰厚。他们的凭借是掠夺大多数的生产者，如予同先生所说；他们的目标是特殊享受，如化鲁先生所说，我以为知识分子的罪恶就在这一点上，他们根本就不想从自己身上拿出些什么来给社会用。许多人共举一重物，几个人却放下手说：“我们不高兴干这

吃力的事了，偏劳诸位吧。”这几个人便是知识分子。许多人在那里蒸馒头，刚揭开蒸笼的盖，几个人却走来把多数又白又大的馒头拿了去（自然还有把整个蒸笼拿去，让做馒头的人空咽馋涎的）。这几个人便是知识分子。所谓学问是他们的牌记；挂起学问的牌记，他们得公然放下手让别人偏劳，又得公然拿走多数又白又大的馒头。我这一节是说，从取得学问的动机上讲，学问本不预备去用的。

学问本不预备去用，一方面也实在无所用。

在从前，从专为应考的八股文试帖诗到似乎颇有大道理的经学史学等等，无非在书本纸笔上做工夫。八股文试帖诗是敲门砖，大家知道不足为训。经学史学等等就很了不起了，钩稽、比核、阐发、疏证，写成多少卷的稿子，刻入什么堂丛书什么斋全集，这是可贵的学问。但是，世间多了一部什么堂丛书什么斋全集，除了供那些不预备用的人来了钩稽、比核、阐发、疏证外，还有什么用处？学校教育兴起以后，一切科学也成为书本纸笔上的东西。试看小学校，国语科固然要读、要讲、要写，而社会科自然科也只是读、讲、写。至于小学以上，能够读者就是最出色的学生。一级一级的书读完了，甚至出洋回国，这好比中了状元，他们便可以著书立说，可以做官治人，可以任教教人。做官一项且撇开不提，著书任教两项实在与从前刻丛书刻全集无异，同样是从几缸现成的水舀出几勺来，拼成一缸，再让无聊的人来舀。我这一节是说学问已堕落到仅属书本纸笔上的东西，所以就功能说，它无所用。

还有一层，占有学问的人物是自成一国的。城墙筑得很坚，城门终年关着；在内的人互相往还：书籍，你做，

我看；演说，我讲，你听。他们把他们的国土位置在高高的空中。他们低头下望，看见与他们自己相对峙的蠢然无知的所谓“民众”。几声“无知啊！”“没有办法啊！”是他们慷慨的馈赠。至于下面的国土里的人当然不能知道上面的国土里在玩些什么把戏。所以，大学校长被驱逐了，报纸上刊着专电，这在上面的国土里自然是件大事；但是在下面的国土里，就把所有的大学都关起门来，决没有一个人人为此搔头摸耳，睡不着觉，或者反而得多吃一口饭。又如前一二年，文坛上有过热闹的情形，谁没落了，谁升起了，大家动色相告，这在上面的国土里自然是盛况；但是在下面的国土里，试拉一个苦力或者农夫来问，他们必将回答从来没有看见叫做“文坛”的这么一座坛。学问在上面的国土里被看作几缸水，由一些人舀出倒进，这并不能算有用，前面已说过。至于在下面的国土里，学问简直像天上的浮云，之聚之散都与生活漠不相关。我这一节是说，学问与一般生活不相联系，所以就实况说，它无所用。

再来说化鲁先生所提起的“作工具”。知识分子作工具是历史的事实，我们眼前就堆着满坑满谷的例子。似乎学问的用处就在作工具吧。然而不然。科举时代，士子读的是诗文，考的是文章，等到被录而做官治人，诗文文章完全没有用，还得从别的方面去揣摩。我们现在，国学专家当厅长，工科专门出身的当县长，他们所做的是与所占有的学问又有什么干涉？所以学问只是牌记，主人看见知识分子挂起牌记，就招他们去作工具了。并不在利用他们的学问。这犹如现在有身份的男人都要娶女学生，只因为她们是女学生，并不问她们是否更适于为妻。我这一节是说，学问对于工具也是无用的。

农人没有学问，但他们种田，供大家吃，工人没有学问，但他们制作，供大家用。文化文人被说得天花乱坠，最基本还在于大家吃用两项上；哲学家可以说出一百种人生目的，最切实的一说该是要使大家有吃有用；没有学问的人却做了最有用的事情，就因为他们肯劳力。可怜的中国由谁支持在这里？统治者想：“当然是我咯。”知识分子也想：“责在我辈”，于是主张大学教育救国。这只是想通而已，实际全不是这么回事。百分之八十的农人虽然受种种掠夺，农村渐渐将破产，他们却担着支持中国的重任。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如果换一个想头，“我们放弃了责任吧，”中国决不就此坍下去；但是如果百分之八十的农人放弃责任，不再劳力呢，其影响之重大谁都想得到的。

知识分子自夸他们占有那些学问，同时安于特殊享受，这是一般的情形。从今倘若有能够反省的，应该觉悟披在身上的花采似的学问实是无所用的东西，他们便走出空中的国土，下降黑泥的土地，把学问向每一个角隅分送，也并没有多大实益；因为他们所有的只是这样的学问，是书本纸笔上的东西，是舀出倒进的几缸原有的水。他们如发愿用这样的东西去赎罪，结果必然颓然而返，身上仍烙着“掠夺犯”的印记。有用的事物该是带着自己的一勺水，倒出这一勺水，大家共有的水的总量便多了一勺；这就是必然有所成，有所产。学问要转成有用的，当然也须有所成，有所产，这非学问先从堕落中被救出来不可。谁来救？系铃解铃，还该让知识分子。那被救以后的学问与以前的截然不同，它不复是书本纸笔上的把戏。它将与种田制作同料，是劳力的工作，是一般生活的营养料。其时空中的国土自然消灭，知识分子无异于农人工人，所以谁的身上都



不负什么罪孽。不负罪孽，更何以用其“赎罪”呢？

复次，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竟做农人工人呢？吃的用的无非劳力的产物，既已吃了用了，凭什么理由可以不生不产？劳心劳力分工说只是统治者的诡辩，有赎罪的存心的知识分子定嗤之以鼻。嗤之以鼻，自己动手：研究化学的同时种一畦田，考察天文的同时织一匹布。

说到这里，近于化鲁先生的“易主论”了。但我以为这并非易主。元朝换明朝，明朝换清朝，凡前朝所有山河子民一箍脑儿归属到战胜的朝代，这是易主。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情形与此不同。分润掠夺品的工事既然不必做了，就已勾销了旧时的工具的名籍；正在手里做的事情却是倒出自己的一勺水，而所有的伙伴也无非在倒出自己的一勺水，谁是主人呢？谁给谁做工具呢？说主人谁都是主人，说工具谁都是工具。所以这实在是转变，一转移间，把旧时的属性地位都改变了。

1931年6月4日作毕